

目 录

解放战争时期武汉市委地下革命斗争概述	曾 惇 (1)
解放战争时期武汉工人斗争记	刘 实 (51)
武汉地下生活的八个月	郭治澄 (82)
武汉大学在解放前夕的应变斗争	关仲夷 (101)
从“和平运动”到武汉解放	喻育之 (114)
我在武昌金口起义的经过	张 轶 (134)
白崇禧在武汉解放前夕的阴谋活动	吴相和 (150)
解放前夕中统在武汉的内幕种种	徐 行 (156)
军统在武汉解放前夕的应变内幕	刘 非 (177)
“四大金刚”之一的自述	
——回忆在武汉“劫收”的前前后后	徐懋宇 (190)
老牡丹花和小牡丹花	陈伯华 (214)
汉口外国租界的产生和收回简述 (附租界图)	
.....	杨 铎、龙从启 (223)
汉口景明大棧事件真相纪要	文史資料办公室整理 (256)
中国四大中药店之一的叶开泰	叶元同 (246)
小笼汤包“四季美”	田玉山 (251)
武汉沿革略识	(267)
附：征集文史資料参考題目	(271)

我在武昌金口起义的经过

张 轸

一、起义前的河南形势 二、积极筹集起义“资本” 三、起义和反起义的内部斗争 四、解放武汉，光荣起义——1.在武汉起义是党的指示 2.退出河南，决定起义 3.第一个起义方案 4.第二个起义方案 5.虎穴脱险，挺前行动 6.高举义旗，走向革命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五日，我率原国民党第十九兵团所属一二七军一个师、一二八军三个师，共二万余人，于武汉解放前夕在武昌以南金口、贺胜桥一带起义，投向人民、参加革命。这一行动，从酝酿准备到高举义旗，历时一年有余。在此期间，共产党解放军的多方争取，个人思想认识的变化发展，内部各种力量的矛盾斗争，情况相当复杂。时间已过去三十多年，仅就记忆所及，概述如次：

一、起义前的河南形势

河南地处中原，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大部时间都在河南。解放战争第一年，我先后任伪郑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和伪武汉行辕副主任等职，没有指挥作战。这一年，河南全省除部分地区有解放军地方部队活动之外，均没有大的战斗。但在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仅以一年时间粉碎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后，河南形势

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一九四七年七、八月间，刘邓大军飞渡黄河，在鲁西南消灭了蒋军五、六万人之后，乘胜跨越陇海铁路，沿平汉铁路以东地区大踏步南进。蒋介石亲飞开封视察，急令武汉行辕主任程潜设前进指挥所于漯河，并指派我兼任前进指挥所主任，负责前线指挥事宜。我即派两个整编师和一个独立旅到汝河南岸的汝南埠一带阻击。刘邓大军冲过阻击线，强渡汝河和淮河，继续千里跃进，于初冬季节进入大别山区。从根本上动摇了豫南地区国民党政权的统治。

陈谢大军也在一九四七年八、九月间渡过黄河，向豫西腹地挺进，在消灭蒋军第十师，活捉师长武庭麟和全歼蒋家王牌队伍青年军二〇六师之后，乘胜前进，仅仅几天功夫，就先后解放了郑县、宝丰、鲁山、临汝、登丰、叶县、方城、南召等八县城，切断了伏牛山南的战略据点——南阳与郑、汴之间的联络，对平汉线形成威胁，迫使我把前进指挥所从漯河撤退到驻马店。

正当刘邓、陈谢大军分别在大别山区和伏牛山区巩固根据地的时候，陈粟大军又在粉碎山东蒋军重点进攻之后，进军豫东，向西直捣平汉铁路。这时陈谢兵团由西向东，对平汉铁路形成夹击。并在西平县一带，吃掉陈铁军的整编第三师。从此，郑州至驻马店这一大段铁路就不再通车了。

一九四八年六月，解放军第一次解放开封，伪河南省主席刘茂恩化装潜逃，仅以身免。接着解放军又主动撤出开封，集中兵力在睢、杞地带歼灭了区寿年兵团。到了秋季，解放军第二次解放开封，同时解放了郑州，中原大地各分散的解放区，便联结在一起了。

综上所述，在解放战争的第三年里，河南战局急转直下，国民党统治体系陷于土崩瓦解。刘邓大军在豫南、陈谢大军在豫

西，陈粟大军在豫东、互为犄角。决定蒋家王朝最后命运的中原地区的有利战略形势，已经为人民解放军牢固地控制住了。在这一年的中原战役中，我始终处于前线指挥的地位。我先后指挥过十四个整编师和四个独立旅，但终于难免整团、整师的覆没。一九四八年四月，我亲自带领三个整编师驰援南阳，若不是急进急退，几乎被解放军包围吃掉。

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提出六个月消灭共产党的武装，我是决不相信的；但共产党能打败蒋介石，我也是怀疑的。解放战争两年形势的发展，特别是第二年河南形势的发展，对我的影响很大。从全国来说，解放军要全胜，蒋家军要失败的定局，我已模模糊糊地看到了。

二、积极筹集起义“资本”

一九四八年夏季，蒋介石为了挽回中原战局颓势及加紧对华中地区的统治，决定改组武汉指挥系统。程潜由武汉行辕主任改任长沙行辕主任，迁往湖南。另设华中“剿匪”总司令部于武汉，任命白崇禧为总司令，我为副总司令。随着武汉指挥系统的改组，前进指挥所退到信阳，改为第五绥靖区司令部，我兼任司令官。开封第一次解放后，蒋介石免去刘茂恩的河南省主席的职务，改由我接替。我于九月间到开封接任后，即将伪省政府迁到信阳办公。至此，从形势上看，我总揽河南的军政大权，但实际上，所谓河南省，其管辖的范围不过信阳附近十几个县而已。我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而且过去反过蒋，这时让我当河南省主席，无非是空头人情。我当时指挥的部队，没有一个师是我的基本队伍。第五绥靖区司令部所在的信阳，已成大别山北的孤立据点。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何去何从，是我考虑的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瞻前顾后，唯有起义一途。

但是我又想，起义不能空着手，光杆司令的起义，对战局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最好有十个师，至少也要有五个师，这才是对革命送的一份象样的礼物。这也就是我当时认为的“政治资本”，回想大革命时，我在第六军当团长、师长，党代表林伯渠对我很好。我要是起义了，他一定会关照我。但林老的关照，也必须要有大的“政治资本”作基础。“资本”大一些，起义后的地位也会高一些。因此，我便开始积极为筹集起义“资本”而耗费苦心。

起初，我认为吴绍周的八十五军是原十三军的底子（抗战时，我任过十三军军长），同我有老关系，可以跟我起义。我还认为鲁道源的五十八军也可跟我一道行动。有了这两个军，再加上一些河南省属的保安旅、保安团，本钱也就象样了，不料，淮海战役开始，黄维奉命成立第十二兵团，蒋介石把当时正由我指挥的吴绍周、胡璉等三个军拨给了黄维。为此，我曾向白崇禧力请把吴绍周军留下，以鲁道源军替换，但蒋介石不答应。当吴军业已开拔之时，我又作最后努力，使该军在新蔡滞留十天之久，但最后未能如愿。吴绍周走后，鲁道源便成了我谋同起义的主要对象。我觉得鲁是云南人，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同我的交情也比较好，可能问题不大。但密商了三次，都没有取得他的同意。于是，我便打消了从正规部队找“资本”的念头，只好另起炉灶，运用省主席和绥靖区司令官的名义，改编地方团队。

河南地处中州，在军阀混战时期，战乱频仍，素有兵多、枪多之称。各县均有地方保安团队，我认为这是筹集“资本”的好条件。我通过伪国防部次长顾祝同向蒋介石建议，由我负责成立几个绥靖旅，将训练补训的正规军，以解决当时兵源不足的困难。经蒋同意，我就取得了在蒋授权中扩军的合法地位。于是，我委派了十几个亲信旧部，去潢川、确山、桐柏、泌阳、遂平、正阳、罗山、光山、信阳、息县等地当专员或县长。我给他们的主要任

务就是收编地方团队，组成绥靖旅或保安旅，同时收容失学青年，编为各旅政工队或宣传队。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拼凑了十个旅。这些旅长是：辛少亭、涂建堂、鲍汝澧、阮勋、张继烈、张玉龙、程晓沧、郭心波、刘子仁和张旭东。其中郭心波和刘子仁是祸害豫东多年的土顽，张旭东是豫南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我也良莠不分地搜罗了他们。后来几经整顿，把十个旅编成两个军。一二七军军长赵子立，一二八军军长辛少亭，原来的旅长大都升了师长。蒋介石又给了个第十九兵团的番号，我兼兵团司令官。至此，我梦寐以求的起义“资本”便粗具规模了。

三、起义和反起义的内部斗争

我之所以产生起义的念头，绝不是偶然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对我就有一些影响，特别是林老（伯渠）对我思想的进步帮助更大。抗日战争初期，我在豫北任师管区司令，曾先后邀请八路军驻第一战区长官部的代表朱瑞和唐天际两同志，到新乡讲过游击战术和群众工作。后来在重庆，又同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邓颖超等领导人有过接触，均受到一定的影响。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开始以前，我主动请民主人士李世璋（现任民革中央副主席）代表我，通过华东地区的党组织，向党中央反映我的思想动态和打算。与此同时，解放军也派出工作人员加紧对我争取。一九四七年底，通过开封地下党组织的介绍，冀鲁豫军区的方敬之同志即同我的大女儿张尹人（潢川中学校长）建立了工作关系。一九四八年五月起，方敬之同志（化名张子庸）多次到信阳，都住在我大女儿张世佛家里，并在我的家属和亲友之间开展了宣传、酝酿和争取的工作。加上我自己对亲信旧部的秘密动员，逐渐在我身边形成一股支持我弃暗投明、走起义道路的力量。这股进步力量，包括五绥区政工处处长张了且、

军需处处长张鉴古、军长辛少亭、师长涂建堂、张玉龙、鲍汝澄、张继烈、办公室秘书吴高明等，他们及其所领导的部队，是我兵团起义的积极支持者和骨干力量。

我是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但我的主要助手参谋长朱其平、秘书长范效纯，都是起义的坚决反对派。朱是日本士官生，跟我十几年，我对他信任不疑，人权和财权都交他掌握。但他思想顽固，坚决反共。关于起义的问题，我同他争论过好多次，他始终反对。他的基本论点是：国民党虽然暂时失败，将来会取得胜利。因为共产党的后台是苏联，国民党的后台是美国。战争主要是经济战和技术战，这两方面美国都比苏联强的多，一旦美苏战争爆发，美国必胜。范效纯是我的学生，是CC分子，曾当过开封反省院院长，迫害过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他害怕共产党，死心塌地反共。但他不象朱其平那样敢于和我当面顶撞，却经常给朱烧底火。他俩狼狈为奸，在下边煽动破坏，致使师长阮锡祺长期托病住院不回部队，张旭东顽固到底，逃向台湾。然而，我们两人除了有共同的顽固立场外，还有一个共同的旧观念，就是私人交情，好合好散。在我说服不了他们，他们也影响不了我的情况下，他俩都表示愿意离开部队。我知其不可挽留，就每人送了一些路费，让他们各自东西了。

我还有一个主要助手赵子立，是黄埔六期和陆军大学十二期毕业生。我在伪郑州绥靖公署当副主任时，他是绥署参谋长。他尊重我是老前辈，我看他是河南的后起之秀，很器重他，所以我们相处得很好。因此，我当了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就把他调来当副司令官。我接任伪河南省政府主席后，他自告奋勇到豫东家乡去收编保安团队。一九四五年十月，他带着刘子仁、郭心波两个保安旅回到信阳。我厂.....起义问题，他尽情表示支持。当白崇禧叫我把十个旅编成两个军的时候，我就把一二七军的.....

了赵子立。赵当了军长以后，表面对我仍然恭顺，而背后却已在暗施计谋了。真乃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此外，在起义酝酿过程中，军统、中统特务对我监视甚严，我对他们也深为厌恶，但又不能不虚与应付。以沈希为处长的五绥区司令部第二处，就是伪国防部第二厅的派出机构。他们不仅控制了军事情报，也过问地方政情变化。还有蒋介石侍从室派来的联络组（军以上的单位才有），既要审阅下面的报告，又要过目我发出的命令。他们自带电台，每晚与侍从室直接通报联系。河南省军统特务头子岳灿远，被派到十九兵团当联络组长，一直住在兵团司令部，对我实行监视。经常对我指名某某是共产党，某某有嫌疑，某某部队靠不住，要严肃整顿。颐指气使，十分猖狂。十九兵团成立时，我捷足保举张丁且为兵团政工处长，就是针对伪国防部第二厅再派人来的一项抵制措施。

我部起义，酝酿时间较久，除辛、涂、鲍、张等骨干力量心中有底外，刘子仁、郭心波、张旭东等，从朱其平、赵子立处亦有所闻。至于其他高级人员和一般特务，因为我当时利用追随李宗仁、白崇禧逼蒋下台的所谓“和平运动”作掩护，使人真假莫辨，起义活动才得以向前推进。但也有人看出真相。如蒋介石侍从室派驻华中“剿总”的联络组长刘伯龙，他就曾多次公开对我说：“委员长对张轸推心置腹，给以军政大权，他还想造反，我非杀他不可。”斗争之尖锐复杂，可以想见。

四、解放武汉，光荣起义

1. 在武汉起义是党的指示

我在中原形势发生战略转折、退守信阳以后，就产生了起义的念头，但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起义，还没有一定思想准备。一九四八年底，河南省参议会议长刘积学力劝我就在信阳、以河南

军政长官名义联合参议会举行起义。他说：“早起义比晚起义好，早起义就是资本，等到解放军来了再起义那就晚了。”我考虑到当时起义“资本”正在筹集，争取军、师长共同行动的工作还在秘密进行，仓促起义，力量单薄，势必会被蒋军消灭的可能。于是，我拒绝了刘的建议。

一九四九年元月初，我派张尹人随方敬之同志到解放区，二野副政委邓子恢同志在开封接见了。邓老指示：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比原来预计的快得多；今后发展将要更快，愿意依靠人民，共产党表示欢迎，希望早下决心；起义地点和时机，最好在解放武汉时，影响要大些。邓老还告诉张尹人，决定派丁一处长到信阳去联系。待张尹人把丁一同志接到信阳并向我传达了邓老的指示以后，我决定在解放武汉时起义的念头就基本确定了。

正当这时，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蒋家王朝大厦将倾。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联合程潜秘密策划了个所谓“五省联盟”的活动，目的在于逼蒋介石下台，由副总统李宗仁取而代之。白崇禧极力拉我为他效劳，并怂恿我同解放军接洽起义，用作缓兵之计，迟滞解放军南下。他还假惺惺地对我说：“再派人去解放区时，就说是代表我们两人的。”白崇禧的如意算盘是：李宗仁代替蒋介石之后，则取美帝的信任，内与共产党分庭抗礼，划江而治，造成南北朝的局面。事为蒋介石及时侦知。蒋便于元月二十一日自动宣布下野，回到浙江奉化，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不久，李宗仁便组织了代表团飞往北平与中共谈判。

丁一同志到信阳后，先住在我女儿家中，后来就住在涂建堂旅部，换上军服，随涂涂出入。丁一同志来我部的时间虽不很长，但对我部进步力量鼓舞很大，使他们进一步认识了党的政策，坚定了起义的信心，从而扩大了影响。由于我不急于在信阳起

义，以及对李宗仁与中共的和谈还抱有一定的幻想，加上信阳、武汉到处是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担心丁一同志的安全，便于二月下旬派张丁且和张尹人送丁一同志回解放区。在漯河，陈赓兵团的周希汉军长接见了他们二人。周希汉军长让他们俩向我转达两点：一、形势发展很快，解放大军向江南进军为时不会很长了；二、希望我早下决心，随时派人来联系。

2. 退出河南，决定起义

一九四九年三月，我奉命由信阳撤退到湖北。从此，伪河南省政府便成了流亡政府，我将省府工作交给秘书长罗震全权处理，自己则专心致力于新成立的部队工作。部队先在花园、孝感一带整训，接着开往武昌以南沿江一带，一边整训一边担任江防。伪第五绥靖区司令部改组为第十九兵团司令部，驻在粤汉铁路线上的贺胜桥车站。

张丁且和张尹人几次去解放区，带回了许多书刊报纸。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土地法大纲》、《将革命进行到底》以及新华社的一些评论，我都认真地学习了，很有收获，对当时的形势也进一步看得较为清楚了。李宗仁虽然代理了总统，但蒋介石仍然坐在奉化向全国发号施令，美帝国主义所扶持的仍然是蒋而不是李。李宗仁所派出的代表团与中共的和谈，决达不到李、白梦想的划江而治的目的。白崇禧几个月来怂恿我同共产党联系，并让我收编团队，由十个旅改编为两个军，以正规军的番号调到江南，这不过是为了壮大他桂系的实力，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决不是让我带着几万人和枪去投共产党。因此，我再也不能跟着白崇禧干下去了。此时，邓老要我解放武汉时起义的指示，已变成我的决心。于是，我就去找我的老长官程潜商量，因为他同林老的关系更为密切。三、四两月，我三次到长沙和程密谈。他对我决心在武汉起义极为支持。我同他最后约

定，我先在武汉行动，他继在长沙行动。后来，我还派人护送武汉大学教授武剑西去长沙，向程潜汇报了我起义的准备情况。

3. 第一个起义方案

我的部队从河南撤退到湖北的时候，白崇禧是准备沿江设防，固守武汉的。开始，他要我的部队担任武汉的城防。我想，这一下可以如愿以偿了。但我的部队新由地方团队改编为正规军，虽有番号，而粮饷不足，白崇禧虽竭力补助，终究相差太远。于是，他又将武汉城防的任务交给了鲁道源的五十八军，而将我兵团的两个军调到长江以南的武昌、嘉鱼、咸宁、蒲圻一带，仍然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我想，这样也好，你如死守武汉，我便在我的防地上迎接解放军过江。

白崇禧交给我的江防任务是从武昌到嘉鱼这一段，一共九十里。地处武汉上游，江北面便是解放军江汉军区的根据地。离武汉四十华里的金口镇，有沟通大江南北的公路汽车渡口，是扼守武汉上游的咽喉。如果解放军在上游渡江包围武汉，金口是最理想的渡口。因此，我在布置江防任务时，把早有起义决心的一二八军各师摆在贺胜桥兵团部以北，军部驻在武昌县的山坡镇。而将一二七军各师摆在贺胜桥以南，军部驻在咸宁县的横沟桥。在一二八军中，我又选派了鲍汝澧师专守金口一段江防。鲍汝澧对于要在金口迎接解放军渡江的光荣任务非常明确。他进驻金口以后，即积极修整码头，控制船只，以备不时之需。涂建堂、张继烈、张玉龙等师，则分驻在铁路和公路沿线的山坡、土地堂一带，一面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一面作鲍师的后卫。

布置就绪以后，我便将我部担任江防及在金口迎接解放军渡江的准备情况，托中共中原局社会部的工作人员赵子平送到了解放区。

我这支新拼凑而成的起义队伍，是来自不同县、区的地方武装，封建地域观念和私人交情特别浓厚。为了统一他们的思想行动，我在贺胜桥举办了一个训练班，由张丁且主持，参加人员大都是中下级军官，为期两天。我还亲自去讲了话。训练班虽然时间不长，但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正当第一个起义方案的准备工作在顺利地进行时，四月二十日，南京政府拒绝了国共两党和平谈判代表团所拟定的和平协定。次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西起九江，东到江阴，在长达千里的战线上，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彻底摧毁了伪国防部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仅仅三天时间，就解放了蒋介石的老巢——南京。这时，狡猾的“小诸葛”白崇禧立刻改变了主意，准备在解放军逼近武汉时，主动放弃武汉，退保广西。因此，第一个方案便没有实施。

4. 第二个起义方案

白崇禧撤退武汉的计划是五月初制定的。按计划，撤退从五月十日开始。行军序列是，白的嫡系第七军先撤，三天撤退完毕。接着是我的十九兵团，最后是鲁道源的五十八军。撤退的路线是沿粤汉铁路与武(昌)长(沙)公路。与部队撤退的同时，抢运物资——俟部队撤完，将不能撤走的所有公私设施全部破坏。我及时将白崇禧撤退武汉的消息和计划，派人告诉了党的地下组织。

我打算在白崇禧的第七军撤走以后，解放军还没有进入武汉以前宣布起义。这时，送第一个起义方案到解放区的赵子平还没有回来，电台联系也没有接通（五月十七日赵才带着电台呼号和密码赶到金口）。方敬之托人送信给张尹人，要他到孝感去联系，由于白崇禧封锁戴家山的交通而没有去成。五月十日，我派张尹人随地下工作人员张笑平一道，由鲍汝澧师防地——金口渡

江，前去沔阳彭家场江汉军区，具体商定了部队起义的有关事宜。规定部队宣布起义后的临时代号为“5555部队”。起义时，摘掉国民党军的帽徽，左臂缠白毛巾等。这些内容，由江汉军区即时电告野战军前线部队。与此同时，我又派兵团政工处长张丁且留驻汉口，同地下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

白崇禧撤退的行动开始以后，我于十二日在贺胜桥兵团司令部小偏院内召集辛、涂、鲍、张等人密商，起义行动待张尹人从江汉军区回来就开始。接着将部队驻地略作调整，涂建堂师从土地堂移驻贺胜桥东面的湖泗桥，扼守粤汉铁路的东侧公路。最后，明确部队起义后的任务为：鲍汝澄师控制金口水陆交通，扣留由汉口撤出的大小船只，截击沿江逃窜的敌军，加强同江汉军区的联系，分驻铁路公路两侧的各师。待第七军撤走以后，截击其他敌军。会后，各自分头布置，层层往下通气，做好起义的准备。

直到这时，我还想作最后的努力，争取鲁道源一同行动。于是，五月十三日，我又秘密到武昌找鲁道源，把地图摊在桌上，从研究撤退的路线开始谈起，最后我干脆告诉他：“你绝对跑不到，不仅跑不到云南，就是贵州你也到不了”。我劝他和我一起起义。他不仅不睬，反而向伪国防部长顾祝同告了密。我又运动他部下的师长段维纲，同他亲自约定，在撤退时将部队拉到铁路以东地区，到时我派人与他联络，结果也没有实现。

按撤退计划，第七军十二日应撤退完毕，但到十四日，该军还在贺胜桥以北迟滞不前。此种情况，并没有引起我的警惕，觉得自己有几万人，白崇禧不敢把我怎么样。

5. 虎穴脱险——提前行动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四日，白崇禧由广州坐飞机回到武汉，立即打电话叫我到武昌见面。有人劝我别去，有危险。我没有听。

上午我由贺胜桥出发，出防地不远就看到桂系第七军的部队向贺胜桥方向开动。途中，又遇上第七军的一个师长，他问我到那里去，我说：“白总司令叫我去开会”。他没有拦阻，我也未加介意。大约十二点多钟，我到了武昌“剿总”司令部。一进门就碰上了鲁道源。贼人胆虚，他的脸色顿时变得通红，与我勉强应酬几句，便匆匆走开了。我当时虽有察觉，但没有多加考虑，就径直来到了白崇禧的办公室，彼此稍事寒暄了几句后，白就拿出顾祝同打来的电报给我看。电报的原文是：“据密报，张轸勾结共匪，图谋叛变，请将共师长以上军官扣押送广，从严法办，所部就地解散”。我看完电报才恍然大悟，虽感事发突然，但仍很镇静，就对白说：“几个月来，我们谈了许多问题，一切情况你都知悉。现在你说怎么办我就跟你怎么办，你还不相信我吗？”白稍微考虑了一下说：“你稍等一下，我去去就来。”说罢，他就出房去了。这时，我已意识到要出事了，就借白崇禧还未回来的机会，出去找白的副参谋长王和华（王是我在日本时的同学）商量。当我经过夏威（华中“剿总”副司令）房间的窗前时，我瞥见白正在与夏对坐谈话。我觉得事情不妙。就对王和华说：“伙计，我恐怕要出事了，你要照护照护。”他说：“现在谣言是有的，好在你同总司令很好，你可以同他彻底谈谈。”过了几分钟，我就回到白的房间。白不久也回来了，他对我说：“明天上午十点钟开会，你立即打电话叫你部师长以上军官都来，你也不用回去了，就住在这个屋子里，我们作长夜之谈。”这时，我心中已经明白，他们要按顾祝同的电报办理，一网打尽了。我当即回答道：“一切服从命令。部队一两天就要出发了，我部驻汉办事处的人都知道我今天上午来武昌，许多负责人在等待我解决一些重要问题，我一定要到办事处一趟。那里有直通电话线，打电话很方便。我叫军师长们明天都来开会，至多一个钟头就转回来。我

很想和你再作长夜之谈。”当时白甚为犹豫，看表情是不想让我去，但最后还是说：“你快去快来罢！”

我一离开白的总部，就如同脱笼之鸟，既不到办事处，也不回贺胜桥，径直奔向金口。我坐上吉普车，带一个随从副官和一个卫士，迅速从阅马场经彭刘杨路往南驶去。为了躲过设在武泰闸上的汽车检查站的特务们，我提前下了车，嘱咐副官和卫士驾车先行，在过桥三里处江边等我。我只身坐船过江，步行三里许，找到吉普车，顺着长江大堤，急驶金口鲍汝澧师部。

到金口后，我立即以电话通知辛少亭、张继烈、张玉龙，要他们到金口商讨大计。不久，又接到报告：驻贺胜桥的兵团司令部及五个直属营，都被第七军包围缴械，公私财物抢劫一空。我听了非常气愤，随即在电话里同白崇禧对骂了一场。这时，一二八军军部尚在山坡，一二八军副军长兼参谋长裴毓华来电话说：“山城驻地已遭第七军监视。”我当即命令裴毓华将一二八军军部立即撤到金口；命令张继烈和张玉龙两师星夜撤离原驻地向金口集中，并在马鞍山等处占领地势，构筑工事。如第七军向我进攻，即坚决阻击。随后，我给赵子立挂电话。此时，电话已经不通，电话也接不上了，我断定其中一定有变。

等各师长到齐后，我就将顾祝同的电报内容和我的脱险的经过向大家说知，听者无不义愤填膺。大家当即决定提前行动，宣布起义。涂建堂在铁路以东，未能到会，通过电台把会议内容告诉了他。张旭东师属一二八军建制，辛少亭军长通知张，军部已移金口，要他到金口来，目的在于逼他随同起义。张参加这次会议后，要回驻德安。辛少亭对我说：“决不能让张旭东走。”张见了我哭丧脸，说：“我随总座多年，应该跟着总座效力。但我在真城一带杀共军太多，我不能不走。我的老母和妻子都在贵州，我只身到贵州去，决不能走部队。”我问他部队交给谁，他说交

给刘团长。我当时碍于情面、心一软，就放他走了。

从信阳酝酿起义开始，赵子立一直表示愿意跟我一同行动。我对刘子仁和郭心波虽有戒意，但对赵确实深信不疑，并希望他能通过豫东的乡土关系，对刘、郭施加影响。不料，他于军长官职到手之后，在紧要关头，叛变告密，几乎置我于死地。他拉走了一二七军的刘、郭两个师和一二八军的张旭东师，并接收了由第七军包围缴械威逼南撤的我兵团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的全部人员装备（少数军官半路逃脱，长沙解放后才到汉川归队）。此外，还将伪河南省政府南逃的机构，一并接了过去。至此，赵子立卖友求荣，夺取我军政职务而代之以野心完全暴露无遗了。

6. 高举义旗，走向革命

五月十五日拂晓前，张继烈、张玉龙两师都到达了指定地点。上午七时，白崇禧的第七军约两个团的兵力，向贺胜桥西北马鞍山我张继烈师阵地进攻；其后续部队第七军约一个师、伪湖北省保安旅约两个团，齐向金口方向急进。裴毓华、张继烈指挥所部奋勇阻击，战斗至下午尚在进行。这时，张尹人已从江汉军区返回金口向我作了汇报，我一面按约定的代号和标志向起义各师布置，一面派人过江向江汉军区报告我部已提前起义的情况。我命令各师：如敌人继续进犯金口，即同他决一死战。其时，进军武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已于五月十四日，在武汉下游的团风渡江，从金牛直向贺胜桥插去。白崇禧于十五日下午四时坐飞机仓惶逃命，他哪里还有时间来同我周旋。入夜，向我进攻之敌均纷纷向南逃窜。我张继烈和张玉龙师趁势截击，颇有收获。涂建堂师在铁路以东湖泗桥一带，截击由安徽向湖南逃窜之敌，也缴获不少人枪。

张尹人从江汉军区返回金口，途经汉阳县山羊头，有伪湖北省保安旅独立支队陈必祥部千余人，在这一带驻扎，正无所适

从。张尹人动员陈参加我部一同起义，陈欣然同意。我令鲍汝澄派人过江欢迎，并将陈部编为一团，归鲍师建制，即日移驻金口附近。

我于五月十五日提前起义，打乱了白崇禧在武汉撤退时大破坏的行动步骤。十六日汉口《大刚报》发表我部起义的消息，武汉市民闻讯，无不兴高采烈。

五月十六日下午，四野十二兵团先头部队进入武汉。张了且通过地下党的介绍，由刘梦夕陪同，向四野师长李伯秋汇报了我部起义的情况。十七日，武昌解放。十八日，我亲自到汉口，见到了四野第十二兵团的司令员肖劲光 and 政委唐天际两位同志。唐政委在抗战初期同我就有过接触，熟人相见，格外亲切。肖、唐两位首长对我部起义，表示热烈欢迎。不久，邓子恢同志（这时已调任四野副政委）来电慰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亦来电表示欢迎。

五月底，起义部队开赴汉川县整编。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我部经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一军，任命我和辛少亭为正副军长，涂建堂、张玉龙、鲍汝澄、张继烈为二一一师和二一二师正副师长，裴毓华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张了且、张尹人为军政治部正副秘书长。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军指战员，在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光明大道上胜利前进。